

# 为什么经典不再继续？ ——兼论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的转型

陈阳

## 摘要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新闻生产社会学第一波高峰过去，此后偶尔有佳作，却难现昔日辉煌。本文尝试着从研究方法的困难入手，解释经典难重现的原因。由于进入限制越来越多、传统媒体面临危机、学术生产的压力以及研究伦理考验，参与观察式的民族志越来越受到冷落，取而代之的是以文本为基础的文化取向的媒介生产研究，在研究地点、研究内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新的文化取向都跟第一波高峰里的组织取向拉开了距离。伴随着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媒介生产社会学也从过程转向意义，从组织取向转向文化取向，在此背景下，我们的任务是，重新回到媒介生产的现场，寻找媒介生产与其他生产活动的差异性与趋同性，跨越生产研究与内容研究效果研究之间的壁垒，发展更富弹性和解释力的理论概念。

## 关键词

新闻生产社会学、新闻常规、民族志

## 作者简介

陈阳，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全球化与媒体。电邮：20050022@ruc.edu.cn。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引领下的新闻职业观念研究”（项目号RMXY2016C012）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

## Why ‘the Golden Age’ Discontinu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ology of News Production

CHEN Yang

## Abstract

In the 1970s, it appeared ‘the golden age’ of the sociology of news production. After the first wave, there lacked distinguished studies in this field. This paper aims to explain why

related studies seldom appeared after the 1980s based on the impossibility of research methods. Due to the limitation to access, the crisis of traditional media, the pressure of academic production, as well as the ethic paradox, participatory ethnography has been replaced by the text-based news production study with a cultural approach. Facing with the challenge from the Internet, news production studies turned away from the organizational approach to the cultural approach. At last,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in the new media era we need to go back to the site of media production, seek for the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between media production and other production, develop more flexible and valid theoretical concept.

### Keywords

the sociology of news production, news routine, ethnography

### Author

Dr. Chen Yang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20050022@ruc.edu.cn.

This paper is granted by the Journalism and Marxism Research Center,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RMXY2016C012).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既是美国电视业的黄金年代，也是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的黄金年代，不仅仅是在商业电视体制的美国，在奉行公共电视体制的英国，同时期也涌现了一大批经典著作，可以看成是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的第一波高峰。这波研究高峰影响深远，很多作品被奉为经典。自八十年代之后，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走入低谷，即使新世纪以来，出现了一些优秀作品，但是就数量质量而言，都不能跟黄金年代相提并论。因此，本文感兴趣的研究问题是：自八十年代之后，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碰到了哪些困难？为什么它难以重拾往日辉煌？在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时代，新闻生产社会学应该转向哪些研究问题？

## 一、“黄金年代”的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

White (1950) 的把关人研究被认为开启了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媒体组织的先河，但是，整个五十年代只有零星研究关注过媒体组织 (Breed, 1955; Lang and Lang, 1953)。七十年代的这一波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并没有延续早期研究的兴趣，而是运用新的社会理论，重新审视新闻生产中的制约因素和生产特征。这些研究的共同特征包括：(1) 虽然研究者采用的理论资源包括了社会建构论、批判理论、符号互动论、功能主义等等，各不相同，但是大多数研究都以“媒体组织”作为研究对象，从组织、科层和专业主义角度关注新闻生产的制约因素，论文里充满

了关于权力、影响、意识形态等概念的讨论（Paterson et al, 2016: 5）；（2）这一波研究关注新闻的生产者，即使研究媒介文本和新闻作品，其着眼点也在于推断记者的态度和观念，而不是就媒介文本做出评价；（3）从研究方法来看，这一波研究基本都采用了质化的参与观察和访谈法（或者民族志——很多情况下这些方法是相同的），量化方法（如内容分析）在研究里居于相对弱势的地位；（4）与研究方法选择相呼应，研究者基本选择一个或多个媒体组织作为研究的田野地点，所选择的田野地点除了工作产品和工作流程的差异之外（比如电视台与杂志社、全国报纸与地方报纸），其雇佣模式和工作内容（比如都关注硬新闻的生产）高度雷同。

在这一波研究中，“新闻常规”（news routine，也有译为“新闻惯例”）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之一。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媒体机构，在学者们笔下，新闻常规并无严格定义，被宽泛地用来指记者在新闻工作中重复出现、约定俗成的习惯性社会实践。为了保证新闻生产稳定流畅地进行，不至于某一天稿件不够没法填充版面，也不至于某一天稿件太多造成人力浪费，新闻机构发展出一套常规，帮助记者应付充满不确定性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实，新闻生产因而得以“驯化”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所以，研究者笔下的新闻常规起初是为了提高组织生产效率而日积月累形成的习惯性规范，它并无强制力，也无需明文规定，新入行的记者从工作实践中慢慢掌握了这一套常规，从而成为熟练记者。

最让研究者着迷的是，新闻常规无意间导致了新闻生产的特殊后果，从而使得媒体机构成为合法化现实的工具。首先，新闻的“事件导向”（event orientation）导致了新闻生产里对于时效性的重视，同时抑制了新闻对社会结构和长期后果等话题进行公共讨论的机会（Schlesinger, 1978）。其次，新闻室的劳动分工形成了一张新闻网（news net）（Tuchman, 1978），记者被分配到不同的地理空间和报道线路（new beat）（Fishman, 1980; Rock, 1981），哪里最容易稳定地供给新闻素材，新闻机构就给哪里分配记者，那些不在这张新闻网上的社会事件，难以被媒体捕捉到，因而难以被报道出去。第三，记者与消息源的关系也需要遵循新闻常规，比如什么样的消息源才是可信的、为什么需要双重核查（double check）、如果在截稿之前无法证实事实那么应该怎么报道等等，所以官方消息源经常被认为是重要新闻事件的“第一定义者”（the primary definer）（Hall et al, 1978）。第四，媒体机构内部需要维系不同部门之间的平衡，各部门之间不能抢对方的线索和消息，保护自己的地盘不被插足，也不能入侵同事的地盘，版面安排是平衡和妥协的产物，并非总是按照所谓新闻价值来排版。第五，新闻叙事的语言有一套潜在的模板，倒金字塔和5W写作就是

一种人人必须掌握的模板，电视新闻记者也明白一段新闻里需要远景中景还是近景的镜头，某个人物镜头应该是仰拍还是俯拍。第六，记者们倾向于继承前任记者的标准来确认自己的新闻判断和选择，从而确立了新旧职业群体之间的传承，形成所谓职业记者的“新闻敏感”（news sense）（Ericson et al, 1987: 348）。

新闻常规的优势在于，它减轻了记者工作的负担，从组织层面降低了新闻生产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了生产新闻的成本。另一方面，Tuchman（1978）认为新闻常规会造成媒体偏向官方立场，从而合法化正当化社会现实，并且以美国妇女运动为例，批判新闻常规阻碍了大众媒体报道妇女运动，妇女运动一旦为了争取媒体报道而接纳新闻常规的要求，那么就失去了原有的激进潜力。即使报道那些令人大吃一惊的非常规新闻（what-a-story），记者也会套用既定常规做法，而不是发展出全新的工作流程，比如，按照既定常规将新闻要素和新闻当事人进行分类，从而再次重复熟悉的模式化新闻（Berkowitz, 1992）。因此，常规亦阻止了新闻机构的创新，媒体是社会现实的维护者而非挑战者。对媒体机构而言，因循守旧是更保险的实际做法，创新伴随着风险和不确定性，并不足取。

与新闻常规研究相关联的另一个研究重点，是关于新闻客观性的研究。Soloski（1989: 213）指出：“客观性是最重要的职业规范，由此产生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其他标准，比如新闻判断、对消息源的选择和新闻线路结构”。客观性是一套“策略性的仪式”（Tuchman, 1978），它拥有自己一整套完整的规范，比如平衡地报道冲突对立的双方、新闻与评论从版面上进行区分等等。通过这套仪式，新闻机构避免了打官司的风险，新闻生产能够不受干扰地顺利进行下去，跟其他新闻常规相结合，客观性的诸多做法也使得权威消息源能够优先出现在版面上，非主流声音被排斥在重要版面之外。

总之，七八十年代的新闻生产研究认为，“新闻生产的组织前提混合了客观性的职业意识形态，常规性地将权势者的声音置于优先地位，进一步强化了新闻的标准化和意识形态化本质”（Cottle, 2007: 4）。这一波研究成果至今经常被引用，但是，在八十年代之后，除了零星研究偶尔能够与这一波“黄金年代”新闻生产研究进行理论对话，大多数研究无论从发表数量还是引用量上，都急剧下降，以至于我们今天讲起新闻生产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成果还是这一波著作。

## 二、新环境与民族志的困难

新闻生产研究里，最常用的研究方法就是混合采用民族志、文本分析、内容分

析、以及辅助性的调查法,其中,参与观察式的民族志是最耗时间精力的方法,对研究者的自我反思和临场发挥也有很高要求。自八十年代以后新闻生产研究急剧消失,究其原因,研究方法面临的困难首当其冲,由于研究者们不能为民族志投入大量时间,民族志数量减少,从而导致了相关研究领域地位下降。

Domingo(2014: 115)在评价Ryfe(2012)的*Can Journalism Survive? An Inside Look in American Newsroom*一书时感慨:“这很可能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后一本关于新闻室的民族志著作了……(因为)花费数月混在记者身边,理解他们的实践、价值观和期望很快并不足够用来分析新闻业的演进”。Ryfe(2016: 38)回应:“我没有花费数月,我耗费数年。……在五年的时间里,我大概在新闻室里耗费了两年半时间。”根据Ryfe的不完全总结,在七十和八十年代,新闻生产研究领域里,至少有14个重要研究采用了民族志,而且基本上都在美国 and 英国进行。不含论文写作和等待发表时间在内,仅仅是参与观察和田野工作这一项,最保守的估计,Tuchman(1978)在十年(1966-1976)时间里就耗费了一年半至两年时间,Gans(1979)在四年(1965-1969)的时间里耗费了整整12个月。经历了八十年代之后的低潮,近年来运用民族志的新闻生产研究零星出现,但是就研究投入时间而言,他们无法跟黄金年代的早期研究相提并论,对整个学术界的影响也不如早期研究那么辉煌。例如,Boczkowski(2004)在三年(1997-1999)的时间里在三家电子媒体新闻室里总共待了一年,Anderson(2013)花了一年时间(2008)在费城媒体界待了七个月,Usher(2014)对纽约时报的研究建立在2010年五个月的民族志的基础之上。因此Ryfe总结,当前的新闻生产研究的田野工作通常只在一年里耗费几个月的时间,而且整个研究时间被压缩,几乎不再有耗费好几年的民族志了。

造成民族志研究锐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跟黄金年代新闻民族志那时候的研究环境相比,当前的研究环境对研究者进入新闻室施加了诸多限制。为了能够进入纽约时报做研究,Usher耗费数月跟报社律师团敲定合同细节,她放弃了对消息源方面的研究,同意报社审读出版前的研究手稿。我国研究者在进入新闻室阶段似乎并无太大困难,即使“线人”(informant)知道研究者的目的在于做研究,也不会想到让研究者先跟报社签合同。媒体机构每天来来往往大量实习生,很多研究生都是依靠熟人介绍而以实习生的身份获准进入媒体机构,实习生跟媒体机构没有成文合同,只有口头协议(李赛可,2017;刘颂杰,2017)。但是,获准进入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在媒体机构里可以自如地跟记者们进行交流,也不意味着研究者可以毫无障碍地获得内部观察机会,记者们对外来研究者充满戒备心,不愿意向外人泄



露自己的独家消息源，不愿意花费额外时间指导业务不熟练的实习生，只有实习生证明了自己具备一定的业务能力（比如独立找到一个选题、完成一次采访、写完一篇稿件等等），记者们才愿意接纳他（张伟伟，2017）。

其次，当前传统媒体正处于危机之中，相比七十年代在大众心目中的声望，早已江河日下，因此，传统媒体机构更加不愿意开放自己的生产后台展示给外部研究者。诚如Ryfe（2016：41）所言：“当处于声望和权力的顶峰时，CBS新闻制作者允许Gans进入媒体机构，这是一回事；当媒体机构面临危机时，它允许研究者进入，又是另一回事。”我有过相似经历。前一阵，我曾经向一家都市报总编辑提出研究申请，他是我大学时的师兄，认识二十多年，然而，人情抵不过现实考虑，他一口回绝：“我们这里都快揭不开锅了，人才纷纷流失，你来干什么？”他的潜台词是：既然你是我的朋友，那么，我们的窘迫日子就不要拿出去丢人现眼了。曾经有好几家媒体机构的编辑记者跟我交流过，欢迎我去他们那里“做调研”，他们的出发点无一例外都是：“陈老师，我们报社面临危机，你能帮我们想想办法吗？”然而，我的想法仅仅是观察、纪录和解释，我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帮助媒体机构解决它们眼前的生存问题，这当然令我成为不受欢迎之人。

第三，Ryfe（2016）和Berkowitz and Liu（2016）都指出了，在当代美国和西欧学术界，学术生产的压力迫使研究者们不得不放弃了民族志。1995年，美国四年制大学里的职位，有一半以上都是终身教职，到了2011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三分之一，然而同一时期，大学博士毕业生的数量在稳步增长。僧多粥少的现实，表明了巨大的竞争压力。美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年轻助理教师，如果想在六年内获得终身教职，那么需要差不多每年发表两篇期刊论文（接受匿名评审的时间不计在内），五年出版一本书，申请终身教职的第六年还需要准备出版第二本书（Ryfe，2016：43）。选择做民族志研究，田野工作至少需要一年之内的六个月，这令年轻学者很可能在申请终身教职时无法完成论文数量要求，因此，为了拿到终身教职，年轻学者们更乐意选择能够迅速发表论文的研究方法，而非民族志。

我国情况与此类似。目前国内学者已经完成的几个民族志，莫不是研究生完成的学位论文（张志安，2006；刘颂杰，2014；李赛可，2017；张伟伟，2017）。Berkowitz and Liu（2016：68）认为，除了研究生之外，具备从事民族志条件的另外一拨研究者就是住在研究地点附近、已经获得终身教职的资深学者。但是，目前我国资深学者尚无人继续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媒体机构。

2010年，一家省级电视台地面频道总监通过同学关系找到我，希望我进入这家

频道进行研究，他开放了自己所有的资源权限，允许我自由出入办公室，允许记者外出采访时带着我和我的研究生，要求所有员工配合我的访谈和工作表，帮我联系他的上级寻求访谈机会。这是绝佳的研究机会，但是，最终我也没能进行民族志，我采用的研究方法是访谈和文献资料研究法。对我来说，进行民族志最大的困难就是空间和时间限制，这家频道距离北京几百公里，作为大学教师，我每个学期每周都有固定课时，不能做到每周一飞，我的研究生也不愿意以实习生或研究员的身份长期进驻该频道。

其实，总监主动联系我进行研究，他的目的是为该频道开播10周年庆典写一本经验总结性的著作，该频道从收视率、广告收入、影响力等方面来看，在当地都是成功的电视频道，身为总监，纪录频道成功就是记录自己的工作成就，也就是说，我接受了这个研究机会，作为交换，我需要满足总监开出的条件。因此，频道里每个工作人员都知道我是来为开播10周年庆典而来，每个人都跟我谈他们工作的成绩和骄傲，避而不谈他们的失误错误和不光彩之处，这跟我的研究立场当然有出入。Jerolmack and Khan (2014: 178) 指出，单纯以访谈为基础的研究是有缺陷的，研究者会忘记，“人们所说的话，经常不能用来预测他们的行为”，即田野研究里研究对象的言行往往会出现矛盾和不一致，而参与观察式的田野研究能够避免这一缺陷。

第四，较之其他研究方法，民族志所面临的学术伦理问题更棘手。我国已有的几个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媒体机构，研究者都公开了自己的田野地点，即使在论文里没有公开指明田野地点，同行读了文章，也会明白研究地点是哪个媒体哪个网站，也就是Berkowitz and Liu (2016: 68) 所说：“参与观察法很容易暴露研究对象的个人隐私，研究成果公开发表之后，研究对象容易面临风险”。

在我写作和发表2010年那次研究的相关成果时，深深感到了匿名的不容易。该频道所有新闻都是本省和本市新闻，如果我的研究报告里涉及任何具体新闻文本，那么很容易被好奇的同行辨识出是哪一家电视台哪一个频道。在写作时，我也力图隐去所涉及记者的具体可辨认的活动，比如某个记者曾经得过中国新闻奖，这个信息我放入论文里，增强对记者专业性的认可，但是，他因为哪一篇报道而获奖，以及他跟我讲述的获奖文章幕后的故事，即使多么精彩有趣，我也不能写到论文里。我拒绝引用一切公开发表的涉及该频道的文章，虽然那些都是可信的文献资料，这也使我陷入艰难的境地，记者访谈资料只能彼此之间，或者跟内部资料进行交叉验证，不能跟他们的公开言行进行交叉验证。即使我如此谨慎，可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聪明的同行还是从我文章里关于总监升迁的信息里准确判断出了这是哪一家频道。

匿名的论文尚且难以保护研究对象的隐私，那些公开研究地点的论文，写作者将会面临更严峻的伦理冲突。以《南方都市报》或财新传媒为研究对象，那么，研究者还能够在论文里坚持对这些媒体及其具体工作人员的批评吗？如果只是一味描述现状或肯定媒体表现，研究者的独立性又如何体现呢？更不用说，如果研究对象读了论文之后心生不满甚至是怨恨，研究者该如何评价自己跟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从事新闻生产研究，学术界跟实务界的距离并没有其他领域那么遥远，换句话说，这个圈子里，经过几层人际网络，大家都是熟人，熟人怎么能够受人恩惠、然后转身批评昔日恩人呢？以后还想不想在这个圈子里做研究了？如果是选择调查法或者内容分析法来研究媒体机构，哪怕是以记者们的公开信或公开访谈为研究资料，研究者也不会面临如此严峻的“独立性与亲密关系”矛盾考验。

### 三、新闻生产研究的转向

由于民族志所面临的困难，进入新世纪以来，学者们研究网络媒体生产时，他们的研究视线纷纷转向了新闻内容、新闻工作者的标准以及受众/用户，很少有人继续关注新闻生产的常规和生产情境（context）（Boczkowski, 2002）。如此一来，“新闻生产社会学”要被表述成为“媒介生产社会学”才能更准确地指示当前研究的特征。

随着媒介产业领域的变革，新世纪的媒介生产研究拓宽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就研究地点而言，第一波研究基本只关注封闭空间里的一个或多个媒体机构。而新世纪以来媒介产品更多呈现出全球生产全球流动的特征，因此，新的媒介生产研究从一个媒体机构转向多国、多地点的研究（Moran & Malbon, 2006）。此外，研究者也组织研究的范畴，运用生态学理论，视媒介为所处城市的复杂生态系统里的一环，研究媒介系统与其他系统的互动（Anderson, 2013）。

在研究内容层面，新的媒介生产研究突破了以往对于新闻和电视生产的传统研究，转而研究其他形式的媒介生产，比如流行音乐、出版业、娱乐业和新媒体，第一波高峰里对于“硬新闻”的关注逐渐被非新闻类内容的生产所取代（Hesmondhalgh & Baker, 2011）。

就研究对象而言，七八十年代第一波研究基本只关注了新闻生产者和制作者，即传统意义上的新闻记者，而新的媒介生产研究关注非新闻领域的劳动者（Johnson et al, 2014），甚至还有学者关注涉足媒介产业的灵活就业临时就业等工作人群（Mayer, 2011），传统的受众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但是在新的媒介形态下，他



们也会成为内容的提供者，参与信息和知识生产，因而也成为新的媒介生产研究的对象之一。

就研究方法而言，长期参与观察的民族志受到冷落，更多研究者转向访谈和观察，以文本为基础的文化取向的研究（text-based culturally oriented research）逐渐兴起。方法层面的转向带来了一个副产品，即研究焦点从新闻生产的过程（process）逐渐转向了新闻业对记者的意义（meaning）以及新闻业在社会环境中的意义（meaning）（Berkowitz and Liu, 2016）。从过程转向意义，研究者所采用的理论概念包括情感劳动、道德经济、共享社区、创意产业等等，这些概念的共同之处在于关注晚期现代性里的自我建构，而且都继承了批判理论，关注媒介生产过程里的权力因素（Patterson et al, 2016: 8）。报道和写作新闻不仅仅是一种策略性的活动，而且也是使用社会中现存观念和意义再次讲述新故事的一种回应性（resonate）活动（Ettema, 2010）。这意味着，新的生产研究的焦点，从组织层面转向文化层面。

如果说，过程取向导致新闻生产研究在组织框架之下关注新闻选择、消息源互动、工作常规等问题，那么，文化取向更加关注媒介生产过程里的文本——各类媒介产品文本、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度文本、公开演讲私人对话文本等等，研究者致力于寻找各种文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普遍模式，从而了解生产过程里的权力运作。

以文本为基础的文化取向研究避免了民族志对研究者时间精力的要求，收集资料的时间更短，过程更灵活，不打扰研究对象，对意义的追问也填补了此前民族志研究的空白点。但是，这一取向也有缺陷，文化取向不适合研究诸如工作常规、工作环境等研究问题，文本的可信度也值得深思（所谓“言行一致”，文本只能展示“言”的一面，却无法展示“行”的一面），文本研究的结果也不能用于推论受众或效果研究（Berkowitz and Liu, 2016: 77）。

#### 四、数字媒体时代，我们应该如何研究媒介生产？

2013年，作为IAMCR的预备会议（pre-conference）和ICA的后会（post-conference），学者们聚集在利兹大学，召开“推进媒介生产研究”会议。在正式出版的会议论文集里，在全书结尾处，Anderson（2016: 234）尖锐地提出，我们所借用的理论和我们所回馈的经验结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已经借用了很多理论，这是媒介生产研究的优势之一，然而，跟研究生产鞋子、航空母舰和科学事实相比，研究媒介生产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我们正在目睹技术对媒介生产领域的深刻变革，当代学者们研究过网络新闻生产，也研究过多平台生产（报网合作）、众筹新闻生产以及VR新闻生产，但是，

大多数研究顶多只是描述和纪录了技术对于媒介生产的影响，缺乏对影响后果的理论抽象和普遍性解释，就事论事的痕迹很重，不能有效展示技术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交织之下新闻业的变革的必然趋势和规律，也不能深入挖掘技术变革对个体媒介生产者的意义，以及对这一代生产者职业发展路径的深刻影响。迄今为止，虽然有零星佳作，但就整体而言，我们缺乏像七十年代新闻生产研究第一波高峰时期那些激动人心又极富洞见的作品。

七十年代的新闻常规研究能够回答Anderson的问题，生产新闻跟生产鞋子有什么不同？这也是相关研究格外迷人的原因之一。按Schudson（1994）的看法，新闻社会学的研究分成政治经济学、组织社会学和文化研究三个取向（approach）。很可惜，自八十年代之后，新闻常规研究局限于组织取向，被认为是媒介结构的组织产物，对它的研究很少突破到个体、文化或体制层面。个体记者被看成是组织常规的执行者和继承者，个体屈服于组织常规，很少有研究者关注个体突破组织常规的案例。

媒介生产研究面临的另一个局限是，它很少突破研究领域之间的壁垒，很少跟内容研究和效果研究相结合。Frame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原本只是普通的日常用语，却能够跨越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壁垒而成为热门的理论概念，相比之下，routine始终局限在新闻社会学的一个小角落里。如果说，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开启了媒介生产的新局面，旧的生产模式被打破，创新的生产模式不断涌现，那么，工作常规依然是组织的产物吗？互联网用户能够影响工作常规吗？工作常规能够影响甚至重塑媒介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吗？为了让常规重回学术视野，我们需要在互联网环境下重返媒介生产的现场。

当研究焦点从新闻转向非新闻领域，从新闻生产转向媒介生产时，我们也许要扩展一下Anderson的问题：生产媒介产品，跟生产鞋子相比，到底有什么不同？更进一步地，研究媒介生产的目的是，如果是为了寻求差异，那么恐怕我们的研究成果无法反哺那些曾借给我们理论概念的社会科学研究（例如场域理论、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等等），如果是为了寻求不同生产之间的趋同性相似性，那么，我们能否认识到，剥去技术变革的外衣，当前的媒介生产跟七十年代的新闻生产相比，二者之间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到底哪个更多？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李赛可（2017）。在希望的田野上步步深入——基于地方新闻网站红网之民族志研究的反思。《新闻记者》，（5），34-44。

- 刘颂杰 (2014)。严肃新闻何以可能：转型社会“价值共同体”的作用——“财经/财新”团队个案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广州。
- 刘颂杰 (2017)。新闻室观察的“入场”与“抽离”：对财新团队参与式观察的回顾及思考。《新闻记者》，(5)，45-53。
- 张伟伟 (2017)。田野调查的身份转变与调适——新闻生产田野观察的方法学反思。《新闻记者》(5)，26-33。
- 张志安 (2006)。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南方都市报》个案研究 (1995-2005)。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上海。
- Anderson, C. W. (2013) *Rebuilding the News: Metropolitan Journalism in the Digital Age*.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Anderson, C. W. (2016) ‘Epilogue’, in Patterson, Chris, David Lee, Anamik Saha, & Anna Zoellner (eds.) *Advancing Media Production Research* (pp. 233-235).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Berkowitz, D. (1992) ‘Non-routine news and newswork: Exploring a what-a-stor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2 (1), 82-94.
- Berkowitz, D. A., & Liu, Z. (2016) ‘Studying News Production: From Process to Meanings’, in Patterson, Chris, David Lee, Anamik Saha, & Anna Zoellner (eds.) *Advancing Media Production Research* (pp.68-78).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Boczkowski, P. J. (2002) ‘The Development and Use of Online Newspaper: What Research Tells Us and What We Might Want to Know’, in L. A. Lievrouw and Sonia Livingstone (eds.) *Handbook of New Media*. London: Sage (pp. 270-286).
- Boczkowski, P. J. (2004) *Digitizing the News: Innovation in Online Newspape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Breed, W. (1955) 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room: A Functional Analysis. *Social Forces*, (33), 326-55.
- Cottle, S. (2007) Ethnography and News Production: New(s) Developments in the Field. *Sociology Compass*, 1(1), 1-16.
- Domingo, D. (2014) Can Journalism Survive? An Inside Look in American Newsrooms. Book Review, *Digital Journalism*, 2(1), 115-123.
- Ericson, R., Baranek, P. & Chan, J. (1987) *Visualizing Deviance: A Study of News Organisation*. Milton Keynes,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 Ettema, J. S. (2010) Crafting Culture Resonance: Imaginative Power in Everyday Journalism, in Dan Berkowitz (ed.) *Cultural Meaning of News: A Text-reader* (pp.271-284). Thousands Oaks, CA: Sage,.
- Fishman, M. (1980) *Manufacturing the News*.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Gans, H. (1979) *Deciding What's News*. New York: Pantheon.

- Hall, S., Critcher, C., Jefferson, T., Clarke, J., & Roberts, B. (1978)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 London: Macmillan.
- Hesmondhalgh, D., & Baker, S. (2011) *Creative Labour: Media Work in Three Cultural Industries*. London: Routledge.
- Jerolmack, C., & Khan, S. (2014) Talk is Cheap: Ethnography and the Attitudinal Fallacy.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43(2),178-209.
- Johnson, D., Kompare, D., & Santo, A. (eds.) (2014) *Making Media Work: Cultures of Management in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i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Lang, K.& Lang, G. (1953) The Unique Perspective of Television and its Effects: A Pilot Stud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8), 168–183.
- Mayer, V. (2011) *Below the Line: Producers and Production Studies in the New Television Econom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Moran, A., & Malbon, J. (2006) *Understanding the Global TV Format*. Bristol, Portland: Intellect.
- Paterson, Chris, David Lee, Anamik Saha, & Anna Zoellner (2016) ‘Production Research: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Patterson, Chris, David Lee, Anamik Saha, & Anna Zoellner (eds.) *Advancing Media Production Research*(pp.1-19).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Rock, P. (1981) ‘News as Eternal Recurrence.’ in Stanley Cohen and Jock Young (eds.) *The Manufacture of News: Deviance, Social Problems and the Mass Media* (pp. 64–70). London: Constable.
- Ryfe, D. M. (2012) *Can Journalism Survive? An Inside Look in American Newsroom*. London: Polity Press.
- Ryfe, D. M. (2016) The Importance of Time in Media Production Research, in Patterson, Chris, David Lee, Anamik Saha, & Anna Zoellner (eds.) *Advancing Media Production Research*(pp.38-50).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Soloski, J. (1989) News Reporting and Professionalism: Some Constraints on the Reporting of New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1), 207–208.
- Schlesinger, P. (1978) *Putting ‘Reality’ Together: BBC News*. London: Constable.
- Schudson, M. (2000) The Sociology of News Production Revisited (Again). in James Curran and Michael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pp.175-200). London: Edward Arnold.
-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 Usher, N. (2014) *Making News at the New York Tim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White, D. M.(1950). The Gatekeeper: A Case Study in the Selection of News. *Journalism Quarterly*, (27), 383–390.